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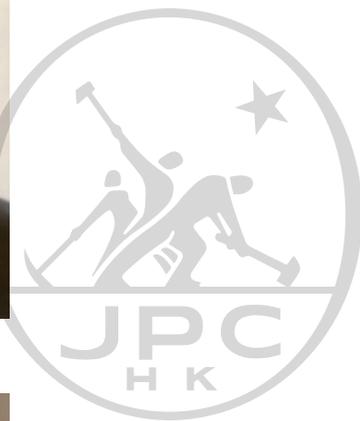
詹劍峰，1902-1982

出生於安徽省徽州婺源縣（現屬江西省），哲學史家，邏輯學家，哲學家。1908-1918年在徽州私塾，1918-1923年在上海中學和中國公學中學部，1923-1926年在國立西北大學和國立北京法政大學，1926-1932年在法國拉封丹公學（又譯為沙多吉里公學）和巴黎大學學習。1933-1982年在安徽大學、暨南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等高校任邏輯學和哲學教授。



詹季虞，1955-

出生於武漢市，物理學者。1960-1965年在武漢華中師範附小，1965-1968年在武漢華中師範第一附中，1978-1982年在武漢大學，1984-1992年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學習，獲得物理學士、科學碩士、哲學博士。1993-2021年在美國空間、國防、通訊和醫療設備工業做研發工作。



約 1928 年，詹劍峰先生（右）和巴金先生（左），桂丹華先生（中）在法國。

的。……神秘主義正處於這樣一個位置，即精神之流在穿過物質時想抵達而又未能抵達的那一點。……假如我們所有人或很大一部分人都能夠像那位神秘主義者這那樣高瞻遠矚，自然的進化決不會停止在人類這一物種上面，因為實際上那樣一個特殊的智者已經早已超越了一般的人。同樣的情況還可見於其他形式的天才，他們也都是舉世少見的大智奇才。所以，神秘主義不是靠運氣而是靠其本質才顯得與眾不同。」^[3]至此，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算是和宗教的神秘主義有了某種一致的效果。這個效果至今依然提醒着哲人們在物質煥發的同時，不忘上帝對我們的愛。^[4]

《歐洲近百年哲學史》帶領我們重新回顧了自黑格爾(Hegel)以降的哲學發展，尤其是科學大步向前行時，思想界所面臨的道德與宗教危機，這種張力一直持續到今天。在此，我們由衷感謝詹劍峰先生翻譯此書的付出，也希望此書出版之際，不忘前人在此精神家園的開拓耕耘，以砥礪我們繼續前行。

黃國象^[5]



序 | i

代譯序 | iii

第一期 一八五〇年——一八九〇年

第 01 章 時代概觀 | 002

第 02 章 約翰·司徒亞·穆勒 (John Stuart Mill) | 008

第 03 章 演化論，進化論，與實證主義 | 018

第 04 章 宗教哲學 | 062

第 05 章 批評論的運動 | 081

第 06 章 形而上學 | 109

第 07 章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135

3 [法]亨利·柏格森著，王作虹等譯：《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

4 編者注：代譯序中其餘引文來自本書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章，依次序而列。

5 台灣學者，畢業於巴黎大學哲學研究所。

時代概觀



一八五〇年左右，所有人們寄予重大哲學和社會構建的，帶著誠意的希望皆成泡影。這個時期就此拉開帷幕，一直延續到一八九〇年。

在這一時期之前，思想界普遍的主題，不外乎申明自然和歷史是一最高實體降生的條件，這一最高實體有人叫它為精神、理性^[1]、自由、人道、和諧，或者叫它為其他名字。嚴刻的決定論（determinism），如果你願意，那就是一個黑格爾（Hegel）派，一個孔德（Comte）派，一個叔本華（Schopenhauer）派所認為萬有中必然發展的定律，在他們的眼光中，這條定律為其終極的自由所補償；所謂自由

一定連接着必然而不可分，自由或者如黑格爾以及孔德所主張，殆為這種必然的意識，或者如叔本華所主張，殆為意識之否定及解脫；那時候一般小說上的主人翁純是一往情深，由於他命定的狂熱而奔放四溢，時而地獄，時而天堂，時而墜入永劫，時而獲得神麻；當時的哲學思想，也具同樣的情感，譬如華格納（Richard Wagner）致威森東克（Mathilde Wesendonck）的信，結尾一段就有這種情感的表現，頗富文學的意味：「當你那雙神秘的和具有魔力的眼睛瞪着我，而我自身融沒在這神秘和具有魔力的眼光的時候，在這一剎那，既沒有主體，也沒有客體，在這一剎那，一切都互相融合，形成一無限的深炯的和諧而無間了。」^[2]

在這種無限而深炯的和諧中，現在感覺到一道裂痕了；人們似乎失去這種深遠的統一之直觀了；最樸實的思想發生一些轉變，這種轉變不再關乎各理論的統一，而是於這些轉變中必有所選擇了。例如黑格爾黨的激進派，左派黑格爾主義，費爾巴哈（Feuerbach）及馬克思（Karl Marx）的黑格爾主義，從他們的老師處抽取社會進步之必然的觀念開始，而以唯物主義（materialism）告終了；泰納（Taine）解釋黑格爾哲學是一決定論的思想，在這種哲學中，所有精神現象歸結到一國族精神（德文，Volksgeist），而此國族精神則歸結於物質環境的影響。這毋須指責泰納不懂黑格爾哲學，因

1 編者注：原文作 Geist。

2 馬勒布（H. Malherbe）於一九三〇年八月五日的《時報》（Le Temps）。

約翰·司徒亞·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自柯勒律治 (Coleridge) 及科萊爾 (Carlyle) 以來，詩人和分析者、先知和反省之士，這兩種典模流行於英國人的思想中，兩派互相攻擊，勢成水火，不可調和。詹姆士·穆勒 (James Mill) 企圖把邊沁 (Bentham) 主義那種純邏輯的和演繹的，嚴格的理智規律傳給他的兒子約翰·司徒亞·穆勒。小穆勒生於一八〇六年，他以過信的態度繼承功利學派的原則，並建立一功利學社。但在他的《自傳》(一八七三年) 中，講述他患精神失常病的經過：這是一種遲鈍地苦痛的情感，使得他對於一切新的興趣之努力，切覺淡漠；他認為他的父親給他的教育養成他偏於分析的習慣，應負這種感情薄弱之責；那個時候，他已看出那種非反省而直接的感情之重要：「如果你要求你是幸福的，那麼，你將

停止存在了；唯一的機會，則把人生不為自己求幸福而為眾生謀安樂作為目的。」當他讀屋茲屋爾斯 (Wordsworth) 的詩，他寫過下列的句子：「沒有詩味的自然派詩人」；在一八三八年，他曾指出，邊沁的方法是多麼卓越，但生命的認識則多麼有限：「他的方法是經驗的；但這種經驗論，對於生命的經驗又如何少」。在一八四〇年，他將邊沁與柯勒律治相對比，後者的見解使其深覺有許多真理未被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者懷疑。

如果穆勒從他幼時所受的教育出發，陳述他的講演和情趣含有聰慧的、明敏的、及猜疑的樣態，我們能夠說，他的精神抱病給他一廣闊的眼界，這是功利主義派所少見的。

I 邏輯

從現代哲學的全部以觀，我們可以指出關於邏輯的研究是很少數的，或者是居不重要的地位；康德確信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所說邏輯乃普遍地同意的；萊布尼茲 (Leibniz) 在論理學上所作的草案，誠有力量，但終留在試論的狀態。然後，在十九世紀中葉，尤其是英國，發生了一次徹底的逆轉。當一八二六年，懷特利 (Whately) 刊佈他的《邏輯基本》(Elements of Logic)；他很明顯地區分論理學和認識論；他規定論理學的實用的功能：論理學的功能並不是發現真理，而是發現一論證的謬誤，例如謬論之減除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的精神論

I 一八九〇年間哲學的復甦

當一八八〇年間，什麼是流行的哲學思想呢？那個時候，我們只見斯賓塞的禁令、叔本華的消極、泰納的簡約，三者均消毀了實有，消毀了睿智的或道德的價值；斯賓塞的禁令，把精神關在不可知的鐵圈裡，並想把一切形而上學驅逐出境；叔本華消極的厭世主義，在一切存在之下，發現個人生存意志的虛幻；泰納哲學的簡約，把精神的事實，歸約為感覺，復把感覺歸約為運動，結果看出一切實在，物質的和精神的實在，皆從一極小極小的跳動 (infinitesimal pulsation) 而湧出，復無限地自相組合；與三者對立的哲學，除了拉許力葉和布特鹿的思想尚堅強有力外，其餘只是

一種瘦瘠的和無足輕重的精神論，繼續維持自由與意識之不可歸納，並把自由與意識建立在一直接的內部觀察上。

當時思想界尚流行一種宇宙觀，將一切實際的和直接感着的生命之意義與價值，全行抹殺、全行消滅，這種宇宙觀似是理知和客觀的苦痛所導出；意識與德性一樣是幻想，生命力的謊言而已，易卜生 (Ibsen) 的劇本，尼采的哲學，指出人類的懦弱是多麼危險，而哲學的任務，則宣佈新時代之將降臨；這種情況極端的結果，則見之勒南的精神，他為尊敬真理之故，不得不宣示這些幻想，遂走到高級諷刺的路上去，將這種義務視作幻想，且由於他的保守精神，或由於他憚於為惡的意念，遂接受這些謊言：聰明反被聰明誤。

其次，在十九世紀之末和二十世紀之初，我們看見一些狂暴的和放肆的反動，這是由一生命的本能所推進而重建的均衡，故許多富有魄力的反唯理主義的 (irrational) 學說從此而出現了，如巴雷斯 (Barrès) 的民族主義，如忠誠派和現代派 (fideist and modernist) 的運動，如布盧狄耶 (Brunetière) 大聲呼籲宣佈科學的破產，和復歸於信仰，如戈比諾的日爾曼種族優越論大流行於德國，凡此種種都是同一的精神所表出不同的病症而已；這時代思想的開展，和前代浪漫主義的運動不是不相似的，以機會論，和浪漫運動是相似的，以混亂和豐富論，和浪漫運動是相似的，以偉大的優美文學的著作論，和浪漫運動是相似的，即以其太缺乏誠實性，或太過於庸俗而論，也和浪漫運動相似的；而當時人

